



# 把知識帶回來：從社會建構主義到 社會實在主義的教育社會學

卯靜儒\*

## 壹、前言

2008 年在瑞典參加歐洲的教育研究會議時，參與 Michael Young *《Bring Knowledge Back in: From Social Constructivism to Social Realism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的新書發表會。這是 Young 繼 1998 年出版 *《The Curriculum of the Future: From the “New Sociology of Education” to a Critical Theory of Learning》* 一書相隔十年之後的新作。當時看書名時，納悶想著 Young 從 1971 年出版的 *《Knowledge and Control》* 一書之後，相關著作逐漸轉向，其與 1971 年專書的立場已有不同，這本書該不會是回到保守的傳統主義去了吧？這麼想著進入會場時，卻被不算小的空間而仍擠滿人的景象所震撼。所有座位都被坐滿，但站著或坐地上的觀眾也滿滿皆是。究竟這是怎樣的一本書，吸引這麼多人前來？一場將近 90 分鐘的新書發表會，從會場觀眾的提問中，我可以肯定這本書的內容不管是理論上或實務上的，皆與當時歐洲所面臨的教育問題有關。

以下將先簡單說明本書的架構與內容大要，繼而介紹 Michael Young 如何提出當代學校課程知識的困境，以及論證社會實在論可以超

---

\* 卯靜儒 Chin-Ju Mao，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暨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教授  
電子郵件：cjmao@ntnu.edu.tw

本文評介：Young, M. F. D. (2008). *Bring knowledge back in: From social constructivism to social realism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越這樣的困境。最後從其過去 1971 年出版的《知識與控制》，1998 年的《未來的課程》，至 2008 年這本《把知識帶回來》，從這三本重要書籍的出版脈絡，評論此書的價值。

## 貳、本書架構與內容大要

本書基本上是 Young 從 1999 年至 2007 年間發表的文章選集。本書架構主要分三部分：一是教育社會學的理論議題，二是政策實務問題，三則是此領域的未來發展方向。在理論的部分，第一章 Young 重申教育社會學研究中知識問題的重要性，區別不同的知識社會學理論的淵源，以導入社會實在主義在此時的重要性。第二章 Young 整理過去影響課程主流的兩個主流思維：新保守的傳統主義以及工具論的問題，同時也批評社會建構主義，認為其有需要克服的難題。第三與四章，Young 比較分析涂爾幹與維高夫斯基對於知識的不同看法，並據以提出他所認為的社會實在論課程觀。第五至七章 Young 認為若要克服社會建構主義的問題，社會實在主義對於知識的看法，可以提供一條生路，同時也能幫助我們思考國家與政策在知識社會學中概念的處理與實務的應對。

本書的第二部分則根據前述所提出的理論基礎，分析特定的課程議題，如有關英國學術與職業教育課程分軌的問題。作者使用許多社會實在主義研究的證據討論 1990 年代英國與南非後期中等教育的課程政策。第八章討論歐洲政府逐漸使用國家學歷認證政策進行教育改革。第九章討論職業課程的知識。第十章以伯恩斯坦概念討論專家知識系統逐漸被目前市場化與更多管制所破壞。第十一章則討論學術與技術分流的課程，重新批判檢視課程整合的問題。第十二至十四章則有關的南非相關教育政策問題。

最後，作者與 Muller 合寫的最後一章——第十五章：則是根據前面的討論，重申課程的知識需要實證與客觀的基礎。作者認為從社會實在主義的觀點來看，知識的客觀基礎是重要的，這不僅能矯正過去社會建構主義將社會群體的經驗化約為知識基礎的弊病，同時也認為社會實在主義是未來課程社會學發展的新方向。

本書最大的特點就是指出目前學校課程知識的困境，並試圖以社會實在主義對於知識的看法，指出教育社會學研究者與教育政策者，甚或實務工作者，一條未來課程發展的出路。以下簡要說明 Young 是如何論證其所認為的學校課程知識之困境與未來的出路。

## 參、學校課程知識的困境

### 一、傳統論與建構論之爭

Young (2008) 認為從笛卡兒以降，邏輯實證論的觀點主宰著歐洲 400 年，他的知識論立場認為知識是客觀的、獨立存在於個別的人類心智之中，人類可以使用知識以求絕對穩定的真理。這樣傳統主義的課程觀點，以學科作為基礎的課程組織，知識被認為是固定的，因此課程理應以經典或精粹的知識為主。也因為這樣的堅持，他們對於獲得知識或傳遞知識的本質或條件很少討論 (Young, 2008)。Bourdieu 與 Passeron (1977) 認為這樣的傳統課程觀維持知識與社會結構秩序，保護既有主流與菁英的優勢。而工具主義的取徑雖然不認為知識是先驗的 (given)，但卻考慮知識的可用性 (特別是為經濟所用)。Young 認為這樣的觀點與社會建構主義有親近性，因為兩者都認為知識是人類的實踐與目的。只是工具論者認為教育 (知識) 要回應社會的需求，目前大學教育強調要能培養為全球化經濟所需人力即是工具主義的觀點。

然而，社會建構主義卻是反對實證主義的知識觀。根據 Young 的說法，社會建構主義的核心觀點就是他們認為「實在」是社會建構的。因此，它有歷史的特性，不是穩定不變的，它會隨著時間而有所改變。所以，從這樣觀點來看基本上所有的知識都是社會建構的，包括理念、信仰、科學或學科知識等，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特性，那就是社會建構（Young, 2008）。

## 二、社會建構主義的缺點與強項

Young（2008）認為當所有知識都只是宣稱者的經驗，這是很有問題的。社會建構主義的學者以及後現代主義者批評實證主義的客觀性，但卻忽略科學知識的生產是無法脫離科學概念。科學概念也擁有其解釋力，是幫助知識生產很重要的工具，知識仍有其有力的地方，不是「有權力人的知識」（knowledge of the powerful），而是「有力的知識」（powerful knowledge）。顯然，Young 的立場是想超越極端的社會建構主義（或後現代主義者）以及無社會歷史感的實在主義。過去認識論的討論，關心的是個人如何可以達到知識，好像這是知識的問題，但科學程序的工具理性，不只是邏輯的一致性或清晰與分辨的問題，也就是這不只是知識的問題，同時這些程序也都是經過特定學科歷史演化發展而來。換句話說，知識的發展不只是知識性本身，也是社會性的。因此，社會建構主義重視知識無止盡地修正，以及與環境的調適。我們需要社會學與歷史的研究以瞭解知識在不同的脈絡中是如何發展與被應用，知識社群是如何轉變，是否專家與非專家，他們是與知識領域連結，或超越知識領域？他們如何建構、挑戰、修正知識？在他們的社群裡或社群外，知識是如何被挑戰的？以上的過程，都會重新建構學校教學科目、學科領域以及課程的來源與歷史；也就是說，知識（學科領域）無法完全只是根據理念或只是專家社群的實施而行。知識社會學的研究也提

醒，我們的經驗與社會的歷史，無可避免都會被轉化成知識的形式，進入知識領域。

### 三、為何是把知識帶回來？

Young（2008）認為雖然知識是社會性的，但也不能簡化所有的知識基礎都是社會性的。他認為社會建構論忽略將不同類型的知識作分野，也就是說，當社會建構主義沒有把知識做分野時，其所論證的知識全變成是社會利益團體立場的一種表達。而受社會建構主義影響的教育社會學者則認為課程只是某些社會團體堅持自己立場，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產品而已。Young 認為依此論點而推，導致我們對知識充滿了懷疑主義。知識不再被認為是一種真理，其客觀特性被完全否定。也就是說，所有的知識宣稱都會被認為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對 Young 而言，後現代與社會建構主義對傳統課程觀的批評固然有其道理，但他們只能侷限於討論課程政策背後權力關係的揭露。這樣的侷限導致認識論上的兩難，一是傳統課程觀忽視知識裡歷史與社會觀點，另一則是社會建構主義的觀點又過度社會化所有的知識（Moore & Young, 2001）。若過度簡化知識問題為利益或立場，或只談解放的可能時，這樣的理論會使得課程等同於政治，忽略教育本身的特殊性。

1970 年代發展的新教育社會學之論述，導致知識最後成為相對主義，拒絕所有的知識論，拒絕任何客觀知識的可能，無法提供課程知識選擇判斷的建議或啟示。這使得課程知識到最後是沒有任何客觀知識可言，只有有權力的團體可以重申他們的經驗，並被視為知識。但 Young（2008）認為經驗與知識是有差別的，若教育社會學只強調群體的社會經驗，而當教育社會學術是在弱學術基礎上時，更易使得立場論的學術策略明顯，導致學者傾向簡化知識為各種經驗的類型，常識的訴求成為一種無法抵抗的力量，而學理基礎的討論卻被視為畏途。這是 Young 的

擔心，本書之標題「把知識帶回來」是他對此學術現象，針對教育社會學術群體所發出的重要訊息與真切呼籲。

## 肆、社會實在主義如何「拯救」知識困境？

社會實在主義崛起於 1990 年代的英國教育社會學，以及南非澳洲、拉美或一些歐洲國家，如希臘或葡萄牙。社會實在論提供實證論與建構論更多的對話與討論的機會。根據 Young（2008）的說法，社會實在論提供方法解決實證論與社會建構論的缺點，但同時也能掌握這兩個知識論的核心觀點。社會實在主義者一方面認同實證主義所堅持的知識是客觀的，並獨立於個人的經驗之外。但另一方面，也同意社會實在主義並不認為知識是穩定的，或可以完全獨立於社會歷史的條件之外。社會實在主義認為知識一方面可以是客觀的，但也有它的歷史社會發展淵源。因此，知識會跟著時間與空間而有改變。就此觀點而言，社會實在論與社會建構主義是有共通點的，只是在解釋知識的社會性上，這兩種理論有不同的方式。社會建構主義認為知識是等同於經驗的，知識的生產是無法脫離經驗脈絡的。就此而言，經驗也幾乎等同於知識。社會實在論認為就是這樣的社會性而給予知識某種客觀性，因為知識是由人們的經驗整理發現而來的，是一種集體的客觀性。但它也會隨著社會歷史脈絡而改變，當然也有錯誤知識的時候，因此知識也不會成為教條或絕對的。所以，就社會實在論而言，知識需要不斷被重新檢視，但儘管人們可能在發現知識過程中會犯錯，我們也不該因此而拒絕知識的客觀性。人們習得一些原理原則的知識，可以幫助他們更準確理解現實，也就是說這樣的客觀知識不該被忽略。而這樣的客觀知識，也就是 Young 與 Muller（2010）後來在一些期刊論文中所說的「有力的知識」（powerful knowledge）。

社會實在主義的方法，使得政策決定者，課程發展者以及教師可以避免一種停滯無歷史感的知識觀，或只將知識等同於經驗或政治經濟因素的反映。Young 與 Muller（2010）認為 1970 年代發跡的「新教育社會學」批評學校課程知識是有權力人的知識（knowledge of the powerful），但這樣的發展也使得部分學者似乎只會一味批評學校的課程知識（只強調知識的外在效度），但卻無法提供有力的知識（powerful knowledge）幫助學生改變處境或社會。所謂有力的知識，是一種重視知識的內在效度，是所有人類過去的生活努力成果，在信度上，在啟發性上，都更具有價值的一種知識，也可以說是更接近真理的知識，這種優質的知識，是人們經由學術努力所逐漸建構的知識。這種知識最明顯的，就是自然科學的知識，或脈絡獨立能使我們超越日常生活世界的知識，它具有類化或通則化的特質。而我們的學生需要這樣的知識，以幫助他們自我增能與改變社會。

## 伍、評價

這本書鋪陳教育社會學過去 30 年的發展，說明從新教育社會學以降，知識如何成為教育社會學處理的重要議題。根據 Young 的說法，教育社會學至 1970 年代學者們（特別是新教育社會學者）才逐漸重視課程裡知識的問題。新教育社會學將社會建構論視為其認識論的基礎。但在 1990 年代一些學者開始質疑社會建構主義有其嚴重的問題，並導致課程理論與教育社會學的危機。因此，Young 反思其 20 年來參與政策擬定的經驗與檢視各種不同理論的觀點後，指出這些當代課程理論中出現知識的兩難困境：傳統課程觀缺乏社會歷史觀，但社會建構論者卻又過於社會化所有的課程知識，使得知識被化約為社會利益團體的經驗。經驗若等同於知識的話，那孩童又哪需要到學校學習呢？教師也沒有其

存在的價值。因為這樣的矛盾，Young 在這本書，試圖提供一個解決之道，也就是 Young 所謂的「社會實在論」，也是本書次標題的重點：從社會建構主義到社會實在主義的教育社會學。身為讀者，我認為這本書有三項難得的價值：

## 一、價值一：理論深度與政策實務兼具

這本書有理論的深度，也兼顧實務。其實，討論課程實務問題，我們需要理論的概念工具幫忙，以解析問題的本質。本書即是提供我們瞭解學校課程中知識的問題。什麼是有價值的知識？什麼是我們應該教的。當我們認為未來的經濟發展是以知識為基礎，而學校又是經濟發展重要的火車頭時，有關知識的概念，卻在教育研究與政策制定被忽略。許多有關知識的問題被視為理所當然，如學習者應該從學校教育中得到怎樣的知識？而這樣的知識是怎樣的特質？這樣的知識在學校課程裡應該根據怎樣的準則被組織、更新或翻新呢？這類問題理應成為課程政策制定重要的議題，但卻在政策制訂過程中被忽略。也就是「學生應該學什麼才是重要的」這類問題在課程政策決定中是核心，但卻常被忽視。這本書處理這樣的問題，幫助我們思考教育裡知識的問題，而這知識的問題不是哲學認識論裡知識本身的問題，或我們知道什麼，如何知的問題，而是思考知識在我們與世界的關係中的角色，也就是知識的生產與傳遞是有關我們如何思考我們與世界的關係。這就是知識社會學的問題。此書提供我們作為教育者，認清自己的知識論，瞭解這樣的知識論，幫助我們在釐定教育政策時，有更清楚的方向。先瞭解知識，才能瞭解教育的本質，最後，才能訂出我們所要追求教育的方向與政策的釐定，這是 Young 這本書一開始即強調的立場。

## 二、價值二：尋求知識與社會正義之間的平衡

1971 年出版的《知識與控制》一書強調知識在教育社會學上的重要性。在 70 年代英國的教育社會學打開一個新的教育社會學研究領域，也影響英國與美國的課程研究。這本書對傳統教育社會學，以及課程研究提出批判，成為在 1970 年代打開教育社會學以及課程研究新視野的一本經典之作。但這本書所帶來的批判卻經常是與政策衝突的。其能有力的分析與批判教育政策，但卻不能提出發展與實施的模式或方法。因此，Young 在參與許多國家政策的諮詢與規劃經驗之後，1998 年出版的《未來的課程：從新教育社會學到學習的批判理論》一書，除重寫 1970 年的教育社會學「新方向」，與討論後期中等教育（16～19 歲）學術與職業課程二分的傳統課程與未來統整的課程發展模式外，Young 也前瞻未來學習型社會的趨勢，從正式教育機構到隨處發生的正式和非正式學習，以及未來知識在教育社會學上的重要性，重新思考社會學與教育政策之關係，此時教育政策更甚於其社會學的思考。在第二本書中，Young（1998）已經提到社會建構主義者的立場，認為必須釐清分開討論課程的認知要素與意識型態要素，只是著墨並不深。第二本書《未來的課程》運用批判理論作為釐清政策目標與作法的概念工具，分析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經濟變遷比以前更難預測，認為未來的學校課程要回應這樣的不確定，以幫助學習者有能力回應他們不確定的未來。在這本書裡 Young 仍想找一個平衡：不僅強調不同專家知識領域的關聯性，也強調重視傳統學科本位的學習。將經濟變遷與課程改革加以連結的分析，使得其能看到教育與工作世界相關聯的一種未來課程的可能。而這第三本書《把知識帶回來：從社會建構主義到社會實在主義的教育社會學》，也顯現這種不斷找平衡，試圖在學校教育知識與促進社會正義間找到平衡。而社會實在主義，則是《把知識帶回來》這本書再概念化新教育社會學（課程社會學）領域的平衡桿。

### 三、價值三：定調學校要教有力的知識，而不是有權力人的知識

Young 從第一本書將知識視為權力的展現，知識是極端的相對主義，到第二本書時，他逐漸看到知識的社會建構性，這部分有些是認知上的社會建構，與社會權力與社會團體利益有關。但在第三本書時，他除強調知識的社會性外，還有知識的脈絡獨立性，他認為這類知識與日常生活知識的差異是不可混為一談，兩者之間是不可共量的。這樣對於知識不同看法的對立，也是第三本書想提出的融合。所以，他轉而找涂爾幹、維高夫斯基、卡西勒、伯恩斯坦等人的理論，提出它所謂的「從社會建構論到社會實在主義」。他認為學校的課程需要兼重兩者，以幫助學習者，特別是社會邊緣或弱勢的學習者，學習「有力的知識」，以超脫原有脈絡的侷限，改變社會。

「在集體的公共情境與脈絡中，所有的意義是被創造」，這些意義在個人的學習過程中會被內化，在這樣的學習過程中，我們會不斷精熟日常的語言，以及後續更精緻的概念內容，以及知識庫，而後逐漸累積精鍊而轉化成脈絡獨立的知識。因此，知識的生產不會只在專家社群裡，知識生產的過程也在人們的日常生活與社會階級性裡，而學校的課程正是要幫助學生，學習如何連結個人日常生活所發展的知識基礎，與學校經過專業知識編碼的課程知識，以擴大學生的學習興趣與知識範疇，幫助學生能習得有力的知識而不是有權力人的知識。藉由這樣有力的知識，學生仍超越原有個人的經驗，進一步改善日常生活中的社會制度與關係。

總而言之，這本書從社會實在主義的立場，提升了我們討論有關知識本質與課程的關係。也對社會建構主義者與其極端的相對主義提出了有力的批評。社會實在主義的一些觀點，幫助我們思考當代課程的議題，提出一些原則，也為教育社會學理論發展提供一些啟示。此書是難

得理論深度與政策實務兼具的一本書。Young 累積了課程社會學過去 30 年發展的學術資本，才得以彰顯上述書本難能可貴的價值。

## 參考書目

- Bourdieu, P., & Passeron, J. C.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UK: Sage.
- Moore, R., & Young, M. (2001). Knowledge and the curriculum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Towards a reconceptualiz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2, 445-461.
- Young, M. F. D. (1971).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curricula as socially organized knowledge. In M. F. D. Young (Ed.), *Knowledge and control: New directions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19-46). London, UK: Collier-Macmillan.
- Young, M. F. D. (1998). *The curriculum of the future: From the “new sociology of education” to a critical theory of learning*. London, UK: Falmer Press.
- Young, M. F. D. (2008). *Bring knowledge back in: From social constructivism to social realism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 Young, M. F. D. & Muller, J. (2010). Three educational scenarios for the future: Lessons from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45(1), 11-27.